

文史資料選擇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工作組編印

大英百科全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根据本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文史資料工作组自今年七月中旬起开始征集有关上海历史資料为主的文史資料。四个多月来，我們有重点地展开了征集工作，已經陸續收到本会委員提供的資料約十万字，現选印一部分編成“文史資料选輯第一輯”，送請本会领导同志审閱，同时并酌送有关单位参考。

我們在这一时期的征集方法是：（一）由应征人写作提供；（二）通过訪問制成笔录；（三）通过史料座談作出紀录。現在选印的材料暫限於（一）（二）两部分。今后我們將繼續采取不同的征集方法，以便利委員們和有关方面人士提供、蒐集和发掘史料。为了使这一項工作能夠順利开展，希望同志們从各方面对我們提出意見和批評。

本輯所收史料大都系提供人各本亲身经历，凭記憶所及并依据一定資料追紀而成，就这一点而言，是适合客观要求的。但也有些地方由於年久遺忘，或由於条件限制当时所了解的事实原不夠全面，錯漏勢所不免，有待於各方面考証补充。因此，欢迎同志們在披閱之后，能各本所知，就史料中所涉故实，尽量补苴匡正，俾臻於翔实完整。

本会委員在提供史料的同时并捐贈旧藏历史文物若干件，其中不少珍品，俟整理后拟編写目录，附入本輯。

本輯系专供內部参考，請勿引用和外傳。

文史資料工作组

1955年12月1日

· 1959年12月 ·

目 录

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李子宽(1)

见 闻 录.....吴弱男(5)

有关李大钊烈士数事

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

章太炎与苏报案

袁世凯跌事刖刖

万福华谋杀王之春

上海四明公所对帝国主义展开斗争的史料.....方椒伯(10)

四明公所的建立

法国人维多强买公所基地事件

英国防军的驻紮和設立巡捕房事件

筑路事件的流血

公所的地址

迭次的盾棺交涉

大屠杀的重演

邮政历史资料.....霍锡祥(24)

帝国主义攫取我国海关和邮政的开始

邮政脱离海关，落入法国的掌握

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邮政人事制度”

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把持邮政及其嚣张跋扈情况

取消“客邮”和民信局

邮务工会的成立和收回邮权运动

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張太雷两先烈

李子寬

我認識瞿秋白烈士时在一九一〇年秋初，彼时我們同屬常州府中学堂一年級初期生，在教室內座位邻接，复以同齡，同城，兼涉远戚关系，比較其他同学尤相接近。次年春（时适在辛亥革命以后，校名已改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張太雷烈士来校就学，由於其族兄和我同班，星期六放学同路回家，彼此亦成相識。

秋白乳名阿双，其髮际有两个旋心（俗称双頂），聞即因此得名。据秋白告我，其在族中属“慈”字輩，原名慈森，諸弟亦各有族名，用“森”“焱”“真”等字，均系五行金、水、木、土等字之三聚迭形字，但均弃而未用。秋白在私立冠英小学校及中学初期均用瞿双，号鉄梅；后始改双为爽（約在一九一四年），同时改号秋白。

秋白童年多病体弱，面色惨白，髮深黄。当我入中学时（一九〇九年入中学补习班），秋白已先我在校，为一年級正班生，較我高半年，即因病留級，以是次年乃与我同班。秋白於何时入常州中学我不能肯定，彼与我为冠英先后同学，我仅在冠英讀过一年，在校时秋白已毕业离校，推知彼於小学毕业后曾停学一个时期。秋白由於体质孱弱故，不好运动，遊息时仅偶而跑跑浪木，打打乒乓，留在自修室時間較多。平时沈默寡言笑，鮮与人爭，即偶遭欺罔不堪忍受事，亦只微露怒容，掉头不顧；較之其他少年立即抗爭甚至恶声动武者迥不相侔。略久始了解其內心常在幽郁惨怛之中，其反应之所以不同，并非由於怯懦。忆在一九一四年前后，同班生顧琴回无錫結婚，来校后於某星期日在校外补請喜酒，秋白飲而醉，哭泣不已，問何所痛苦，則曰“伤心人別有怀抱”，再三問，而所答仍此七字，不作他語。秋白果何事伤心，別有如何怀抱，日后从

未向同学吐露。由此可知其在童年精神上已飽受刺激，只以事在家庭，格於情愛及旧社会其他觀念，遂宁自緘默耳。

秋白父稚彬不治生产，仅能作画，画以人物較見長，但未臻佳妙，不为时人所見重，因而不克賴此以維生計，何况更有鴉片烟癮。母氏金，同邑賢庄大族女，与稚彬有同嗜。我曾於訪秋白时見瞿父瞿母於其家。时秋白已移家於寬渡桥瞿氏分祠中，知瞿母体弱甚，肤色灰白，有烟容，无人色。秋白及其一妹三弟似均愛母深於愛父。一九五〇年常州人湯中（号爰理）拟写述秋白家事刊售，聞我知秋白青年时情况較詳，曾來訪晤。湯瞿两家旧有戚誼，彼悉瞿家前輩故事因而略詳。据談：稚彬为旧宦家纨绔子弟，早年席丰履厚，生活寬裕，其叔任湖北学政及其他优缺，官囊丰满时乃建八桂堂第宅。但家眷隨在任所，屋既工竣，不愿空鎖，即囑託稚彬为之經管出租；（当年我先父曾租住过八桂堂部分房屋，后我家在同巷自造住房迁出，此系六十三四年前事，当时秋白与我皆未出生；我曾聞老輩談到借住八桂堂旧事，与湯中所述相符）；瞿金朕姻即在八桂堂，喜事鋪排富丽堂皇，一时邻里为之興动，以后叔姪間起齟齬，屋主将屋收回自管，稚彬遂迁出別居，自此家境日蹙，年甚一年，入於逆境。

当秋白在中学肄业之际，正值他家庭逐步接近山穷水尽的阶段，秋白对同学不談家庭情况，但偶尔說及籌措学費之困难，每逢新学期开始总須拼湊借貸；其住所亦於此阶段中由租屋而改为不負担租金的借住家祠（忆在一九一三年前后）。此时常州社会視住祠堂为不名誉現象之一，非万分无奈決不出此。其家在祠屋最后一进之敝厅（俗称享堂，即祠祭后族人宴会之所），厅凡三間，中以大屏門隔成南北两部，南部东間临时以簾布漫作障，別为一室，秋白父母即以比為同房。北部屏后（俗称翻軒），东首則以书籍若干只堆砌作短壁与中間隔开，即秋白下榻与讀

本之所。书箱中所收藏者，据秋白发示之品，印谱画谱不少，此外则画刊如“吴友如画宝”之类。秋白所爱之治印学习参考之品，为陈曼生鄧石如等印谱，及赵××之百美印谱、百将印谱。此乃秋白胞伯所留存于家乡者（其胞伯侨居杭州）。书箱中尚有近代人譚嗣同、梁启超等与当时所谓维新有关之刊物如饮冰室文集、仁学等等亦皆其伯父所寄存，此皆与秋白修养具有多少关联。我仅见过霍母一次，不久即得其服毒耗，我往吊丧时秋白始告我以家庭难以支持，将謀安置弟妹，是时其父尚在常州，我曾见及，但知其急于去他乡謀生，旦夕即将成行而已。

秋白在中学时，一般课程正常而已，无独特见长处，当时第五中学学风偏重课本范围及行动纪律，师长一味贯彻主观愿望（主持校务者系留日学生，模仿日本教育办学），不注意多方启发思想，而且歧视意志比较活泼之青年，担任训育之学监等偏颇更甚，因之秋白及我輩年龄较老者辄成被厌恶之对象。秋白不以为意，独于课外读物，尤其是思想性读物，研读甚勤，如庄子、仁学、老子道德经、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在民初中学初级学生中能注意此类读物者并不多见，尤其是江苏五中。我班同学受秋白影响亦偶向借阅饮冰室文集及仁学等，此两书内容秋白在校时常引作谈助。惟庄子除秋白外，他人皆不易无师自通，亦惟秋白能独立思考。

省立五中制度，上午上课四小时，下午上课两小时；下午三时后，学生主课较差者补课一小时，如国文、英文等。其他学生则于此时间上游艺课一小时，游艺内容有书法、篆刻、军乐、雅歌等，由学生自由选择分组练习，秋白曾一度选雅歌（崑曲）学“拾金”一出，既而弃去，以后彼于著作中曾批评唱曲行腔咬字不尽符自然，其认识即基于此。后一年改习篆刻（治印），我亦与俱，其时发现秋白于小学（说文）已具相当知识，于各种印谱早有研究，较诸我輩初作尝试者迥然不同。秋白

於治印之皖浙兩派，於浙派較為愛好，所治印章在校時為多，母喪以後，我鮮見其篆刻石。秋白於音樂能吹洞簫，偶於月夜一吹，音調婉轉而淒楚，似惟此能適合於其情性。於國畫能作山水，但亦不常作，在校時只寫過兩三幅，我巧得一幅，其他歸於何處今不復能憶。

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秋白課餘時間附諸於吟咏者不少。最初，我班同學年齡較幼者四人即江都任乃闓，宜興吳南如與秋白和我，相約學作詩詞，从咏物開始，我未得其門徑，不久即退出，秋白與任吳樂此不疲，各存二三百首，抄錄成帙。秋白與任君進步尤速，惜稿早失。三人中惟秋白間亦作詞，事隔四十年其成品亦不復能追忆矣。

一九一四年冬秋白因病未參加學期考試，留級，不復與我同班，次年遭母喪，暑假後學費無着，且家庭生計亦成問題，因輟學，去無錫某小學任教。

一九一七年八月我到北京，秋白已先我月余到來，借寓東城米市大街克林德牌樓北路東某木廠中（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未畢，所謂克林德碑之石牌坊尚未拆移中央公園改為和平紀念坊）。我往訪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燈夜讀甚艱苦，時已確定入外交部俄文專修館。據秋白告我，原擬入北京大學文科（此年北大文科招生，不要文憑，只要程度相當），曾商之於所投奔之堂兄純白（霽常）。純白時供職於交通部京漢鐵路局，兼俄文專修館法文教員，值中交票貶價時期，月薪所入不敷家庭開支，不能為秋白籌學費，因勸秋白入俄文專修館，請在就學時期當為秋白力任膳宿供應，大學學費則非力所能堪，俄文專修館免費可以走讀。此為秋白當時專習俄文之緣由。不久純白遷住東城草廠二條胡同，秋白亦遷往同居，後秋白二弟灼白亦來京，昆仲同住後院東屋，生活頗清苦。我不時往訪，秋白亦偶來北大宿舍，往訪皆徒步，我去時偶和秋白同飯，常以白蘿卜和干貝——兩小塊或蝦米少許就煤球爐上狂煮，以湯佐餐，取其味雋，不需更加作料。

亦不求量也。此时秋白与同班生常州徐昭、宜兴朱某出入相偕，均攻讀甚勤，尤以秋白为最，因是成績亦优秀，为同学所推重。五四运动起，秋白被推为俄专学生代表，与各校联系活动。張太雷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代表，屡次来京，旧雨重逢，与秋白过从頗密。太雷服膺社会主义較早，在津久已参加社会主义文献之譯述工作，虽进行工作之际，相当秘密，但我輩亲近同学已知其事。就我所得印象，秋白思想之轉变得力於此一阶段，太雷之被进应不在少。我之发现秋白傾向於社会主义亦即在此时间。时虽已在十月革命以后，北大政治系教授莫敢於講室中談論俄事或發釋社会主义精义；或者由於大都系英美留学归来分子，本少关心到此。一日秋白問我：北大政治系亦研究社会主义否，我答以仅偶尔提到，并未引起注意或詳作發釋。秋白謂“應該研究一下”，語至此戛然而止。此简单几句当时即使我感到秋白的新傾向，其后秋白太雷不时偕来北大訪李守常先生，来时輒到我室，我所得印象益以清晰。卒尔有时訪李为餐洽活动經費，其他我未尝动問。在此一阶段，我知与秋白往来較密者有耿濟之（匡）、郑振鐸、張昭德、瞿世英等数人，耿張均俄专同学，世英（菊农）則秋白远房族叔，其父时任內政部部僚，寓处去草厂二条不远。

一九二〇年秋，我兼北京新社会报事，移住宣武門外，同时学校不时罢課，鮮去东城，因不常与秋白相見。不久梁启超資助北京晨报款子一笔，由报社选送学生三人去苏俄留学兼为报纸写通信，秋白是时在青年中早露头角，且不时在晨报附刊投稿，为报社所注意，遂膺首选。成行之前我曾北大同学金誠夫与秋白合攝一影作临別紀念。金亦五中旧同学，与瞿母同族。（原件已於前年寄交秋白夫人楊之华同志。）

張太雷小名泰来，幼孤，且系遺腹子，由於其母有否極之感，故名泰来，在常州西郊小学及江苏省立五中时学名張复，命意相同。一九一五

年投考北大，始改名會訖，則从族中同輩以“訖”排名矣。參加革命乃名太雷，實就泰來轉音。家貧，賴母薛氏勞作撫養，間得親屬接濟彌補生活不足，太雷學費即由族中資助，在中学時偶尔并向知己同學借貸拼湊。太雷身健氣壯，精神勃勃，勇於進取亦勇於改造，有肝膽，不畏強御，見不平敢於鬥爭。在中学時曾一度傾心耶穌，虽當時學校星期例假只有半天，太雷於星六夜回家之後，翌晨即由西門趕到東門教堂傾听“講道”，未曾缺席；但一經發覺說教並不合理，立即轉變。一九一五年暑假中我偕其來投考學校，車廂中有傳教士中途向乘客演講傳道，太雷即起而痛加駁斥，教徒為之收聲，其堅決態度方之前之虔誠信仰判若兩人，其勇於革新、勇於鬥爭大率類此。

太雷肄業江蘇省立五中，其畢業期應在一九一五年年終，但在此年暑期即提前离校。事緣暑期之前校中曾起風潮。我以醫科教師為訓育人員所不滿，首被除名，但除名布告不舉具體事由，僅謂某某“桀驁不馴不堪造就”我班同學不以為然，提出質問，卒至罷課旬日，先後开除學生五名。學監意欲示威，對於異班同學亦加壓力，於放假之日揭帖於窗謂“某班近起風潮，張復、瞿爽素行不謹與李某相似，如不悔改，下期毋庸來校”云云。太雷不堪無辜受辱，遂決意投考他校。是年后期乃入北大預科，同年冬又考入北洋大學特別班，於次年升入法科法律系。

太雷本意擬於北洋畢業後回南充任律師，但在一九一七之後，思想突起轉變，其傾向於社會主義實在五四運動之前。憶一九一八年秋初我於假後回京，中途曾至天津北洋大學，時五中舊同學在北洋者不少，即有人以太雷堅決轉變之情形告我，謂“太雷已醉心於另一種新的做人標準，放棄舊的處世途徑，態度甚堅決”。如此云云虽用語模糊，實已說明傾向。同時我且知悉太雷於每日自修時間中秘密翻譯社會主義革命文獻，其原稿為俄文，先有人自俄文翻成英文，然後由英文譯成中文，太

雷分任之工作即自英譯中，原稿得之於天津法租界某處。一九二〇年太雷在北洋大學畢業之後並未別謀職務，即為革命奔走，常往來於京津之間，到京時輒携手提小皮箱兩只，逕至北大東齋我與金城夫同住之室內置兩箱於床下，匆匆數語之余，即往訪鄧中夏或張國燾。有時瞿秋白同來往訪李守常。太雷留京一宿即去，問所往，則答去長辛店，余等見其箱內所存皆為宣傳鬥爭之小冊子，方知其任務乃在振起鐵路工運。太雷亦曾去蘇俄，時在秋白赴蘇之後，未經由領取護照手續，聞系經黨的組織照料，喬裝通過邊境。一九二二年我重到北京，太雷已回國。

見聞錄

吳 弱 男

有关李大釗烈士数事

我在东京識李守常（大釗）时，行严方在办甲寅雜誌，守常住早稻田支那部，时向甲寅投稿，大約每月輒会晤行严一次，有时即在我寓处共飯，因而我亦漸成熟識。守常与我同年，生辰較我早十八天（我生於旧历丁亥十月二十八日），守常談論時事心直口快，彼时即常提到社会主义，但余不注意於此，因而不甚了了。

回国后，行严引荐守常於蔡元培（元培），建議便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館长，得蔡同意。我寓居北京时，常向北大图书馆借閱图书，守常亦时來訪行严就所拟向国外訂購之图书，評議当否，彼此遂益接近。此后守常亦偶因館員所草拟之购书西文函电不能当意，就我斟酌修改，有时談久，即留我家晚餐，如是者三年余。前后所商拟之文件，間亦涉及他事，但从从不向我談到党的活动。我知守常常与俄代办齐乞林見面，但亦从未向守常探問究竟。守常知英文，仅操英語时发音略欠准确，見齐交談即用英語，当时彼此熟識，友人頗有疑余从中傳譯者，实則匪是。守常仅於每次見齐之前，就所談問題要点，預拟語句，囑余为之斟酌潤色，求其意义益为显豁而已。因此，守常每次晤齐必事前准备一两小时，其办事縝密，於此可以想見。苏俄使节最先來华者为越飞，繼之者为加拉罕，守常早与秘密联系，但我均不詳悉底細。仅有一事例外，確知守常貢獻独多，即促成一九二二年中山越飞共同宣言的发表，越飞使华系列宁亲自決定，而共同宣言之发表关系嗣后中苏的联系甚大，指出了外交上正确路綫，守常於此事前即南下謁孙，做好准备工作，若非守常从

中奔走，当时成就恐未必臻圓滿。越飞曾一度邀余夫妇与蔡子民李守常共飯，但未深談。当时外交团中人物冷遇俄使，不談不睬，极难堪，俄使甚少机会与外間交际，行严某次虽就越飞談农业，冀获裨益，越終未肯多言。

守常曾图游說吳佩孚，因其友白兴亚之介見吳，冀吳轉变傾向社会主义，吳不听，且迷信相人術，私語白兴亚，言守常貌相不善，不久將“遇鉄”，白傳为笑談。

守常遇害前之一年半中，每周来余寓两次，为我三个儿子詳解社会学，張次溪为守常写傳記，行严曾为作序，曾提到此事，但誤作教授政治学。就余所知，張之傳記本文中，亦不少訛舛，且取材多抄录报纸，未尽翔确，宜予訂正，行严亦有此評語。余旧藏守常半身照片一幀系守常所贈，且有其亲笔題詞，为次溪借去，原件迄未交还，聞已遜献历史博物館。

守常生活恬淡，自奉甚儉，而急人之急，月薪所入，偶有羨余，輒以应貧乏朋友不时之求，因是家无积蓄。守常被捕之先，避居俄使館已三月余，我尝假託为儿子請求签发护照，去使館見守常，劝其火速設法出国赴俄，并建議先化装离东交民巷到我家暫匿，行严知风声紧，亦力主速行，楊哲子同时亦曾私函敦促，仅守常夫人（时同在俄使館）顧慮家庭生活，冀先料理，独主稍緩，而守常殊鑒定（其时同在俄使館学生已有黑夜踰牆出走获达安全地点者）。不久北政府遂取得各国使館同意，突派軍警包围俄使館搜查，拘守常等，以虎繩綑縛架去，除齐代办一人而外，俄館人員亦同样被綑架无一倖免。是日路人見有大車載空棺多具到看守所，可知当局早具杀心。行严聞訊，由滬遣返北京，犹冀設法轉圜，先見張学良、楊宇霆陈說，謂共产主义在国内犹在空洞談說經濟理論阶段，不宜穷治，可知守常等石期徒刑，准其携带資本論等书籍，移

沈阳监禁，情节較輕者可逕行开釋，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別生支节。学良首肯，楊亦同意，於是由張楊先容入見張作霖。作霖躊躇，謂此事未容独断，須与京外十一將領（張宗昌、褚玉璞、韓复榘等）商量。至是，行严知已无望，但仍請張分別函詢十一將領，不宜以联銜通电征求意见。願不久而十一將領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仅談空洞理論应对罢工罢学負責，非严惩不可，守常等遂終於牺牲。同时就义諸烈士中，我惟知張挹兰（北大女生）一人，張在京为守常工作极得力，守常与俄使館联系，凡关系重要之件，都面告挹兰。守常子葆华於守常就义之日得日籍共产党员某庇护，携往日本避难。守常夫人同时在俄館被拘，被釋在守常就义前一日。守常死后，其家所余家用現金不足一元，余与其亲友商拟筹集壹万元贍养遺族，經众討論以款不易集改为三千元。願分投奔走，有力者惧遭連累，避謝未恐不速，有心者只机关学校職員及少数同乡，力不从心，結果仅筹集二千数百元。当时以棺木过薄，就中支取二百六十元，另购一具改殮。喪葬事毕，仅存千余元，乃为之存放，由守常同学白眉初及陶玄等共組委员会管理，以息金支持遺族生計。其后若干日有女子作农家少妇装涂脂粉，插銀首飾，藍裙綉鞋，似有意故乱偵人耳目，前来委员会云有汇款两万元将交来恤守常，請委员会先給收据，須由委員全体具名。当日签名未齐，女遂持据去，謂翌日即送款来，但俟之多日，竟不复至，款无下落，至今可疑。

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

同盟会最初女盟員不多，加盟最先者为何香凝、秋瑾，余姊妹略迟数月（余妹亚男），此外尚有廖仲愷之妹冰心及孙少侯妻，冰心患肺病早死，孙妻系旧社会家庭妇女，始終未出头露面，其姓名亦未經公开宣布。盟員加盟之初应先亲笔填写誓約两份并謁見中山先生作一次談話。誓約

一份交小組長，另一份呈中山先生保存，手續僅如此而已。余姊妹加盟動機，在於當時思想上受到新民叢報影響，深切感到中國婦女壓迫重重，毫無出路，同時更從報刊中知悉美國婦女獲享自由，遂由羨美而決心參加革命，此時得皖同鄉合肥人吳陽谷介紹（吳系皖人加盟之第一人），余兄妹三人遂於一九〇三年同日加盟（余兄吳炎世）。以後余等具有排滿思想，乃由於中山先生之薰陶。諸女盟員中以秋瑾最勇於實行，不常在日本，秋與其夫王某離異後，將女王霖芝託母撫養，脫卸羈絆，積極活動。

我赴日留學之前，在上海中西女塾讀書三年，去時年僅十四，初擬入夏田歌子所辦實踐女學校，但彼時該校支那班限額三十名，且限定學齡自十六至四十歲，余年齡不合，乃改入青山女學校。中山先生對於女盟員關心周至，特託日本婦女界中同情中國革命者照料余等日常生活，如宮崎寅藏夫人之姊前田夫人是。當時日本閨秀并有投身為管家婆以工資捐助孫先生作活動經費者。此時中山先生在東京行動並不自由，日本當局受清廷囑託，注意中國黨人行動，中山行蹤如被日警發覺，即住不下去，只得跑往美國。日人如宮崎民藏（素主土地革命）與三十三年落花夢作者宮崎寅藏都同情中山，彼此友好，兩人夫婦俱成中山密友，隨時對中山盡力照拂。中山對人極寬大，遇同志尤然，（國人以“同志”稱同黨成員自中山始）然有時過度，因而受累。如薦舉湯漪銘一事可作例証，湯在留英時加盟，未數日即後悔，乃乘去中山寓所談話之際，盜竊盟約。時中山實受英人監視，居自稅屋寄寓，而每日有警察和新聞記者一人前來窺探行蹤，舉動極感不便，寓所樓上下各一室，樓下為中山接待西友之所，樓上則供先生起居，盟員來訪，因談話略便輒延至樓上，湯來時亦然，不期同時適有西友前來，中山不虞有他，即留湯在室，迨下樓與西友晤談，湯於案頭髮覺中山先生之皮包，固知有盟約在內，即

乘隙於怀中出小刀，划破皮包，将其中所存盟約多份悉数盗走，且持向駐倫敦中國使館告密，其人之惡毒陰險至於如此。幸其時充任公使之孫寶琦解事，立將湯所呈之盟約當面投入壁爐火中焚却。辛亥革命后中山回國，湯向中山悔過，中山寬假之。南北和議后，袁世凱故向中山請荐賢能，中山未及與諸同志商，逕電举湯及蔣作賓。親信如胡漢民汪精衛亦未預聞，迨我等知悉，逆料將致惡果，曾擬請求中山補救，但行严以為事已无可挽回，始作罷論。其后湯蔣均被袁利用，而湯在督湘時期慘杀民黨，更屬罪大惡極，致有湯屠之稱。揭中山及黃克強告我，湖南民黨分子被其杀害者數達二万余人。

辛亥中山回國后会乘小炮艇去漢口與黎元洪晤談，我与行严以民立報記者身份充任隨員。當時孫黎分任正付總統，其密談內容我不明悉。此行成員中婦女隨行者僅四人（余與宋藹齡及中山先生之兩女），當時全體人員曾合攝照片留念，此照我近年曾於革命歷史紀念館見之。我於一九〇四年識行严，翌年我任民報社秘書，時章太炎已到東京，但未有固定住址，先父每次給太炎書信，均附入給我的信內，由我親自轉達，因此由太炎先生之介紹，我乃與行严相識而成朋友。是時中山先生愛行严才希望其參加同盟會，冀我与行严結為夫婦，因我的关系，投身加盟。同盟會其他同志，亦具同一希望，每值行严蒞晤時，故意騰出座位，使我与行严接席；有時會談既畢，并遣行严護送我回青山女校，但行严始終堅執，不願加盟，曾囑我轉語中山，“愛情與政治不能相結合”。我識行严后一年，由於太炎及孫少侯之建議，我俩始訂婚約，我年小於行严六歲，在青山女校英文專科畢業后回國，先后任天津初級女師範及蘇州景海女校英文教員計一年有半，始籌得川資前赴倫敦與行严結婚，計時已在訂婚后五年。嗣后胡漢民汪精衛居正田桐諸旧識，談及往事，曾說笑話，謂“同盟會之於章行严可稱賠了夫人又折兵。”實則行严早拒